

「關秀媚好正。」

1995 年我第一齣看的電影的確是《賊王》。

但說「關秀媚好正！」這句話（或作出這個美學判斷）的不是我，是健。

對上一次見到健，已是舊年 12 月，在中大本部。他和同學一起，當中絕大部分是女的。不知他們在說甚麼，只見到健在笑，根本察覺不到我就企在不遠處。

如果笑某程度上代表不悶，那麼我的 Year 1 上學期的確好悶。而如無意外，下學期的情況也不會得到任何改善。

沒所謂，我同自己講，人愈大就只會愈悶，所以有需要早一點習慣沉悶。

1995 年 1 月，新年的第一個月，同時是農曆年最後一個月，沒想過，在年廿五的晚上會突然收到健的電話。

「約你看《賊王》，明天最後了！」單聽語氣，還以為是甚麼大事。

或許因為，健已有一段長時間沒找我看三級片，我們也沒有再約上去 Paul 屋企借 AV 看（Paul 是我們讀中學時絕無僅有的 AV 提供者，升上大學後，已沒見面），我立即應承。

「明天 12 點 UA6 等，先到先買飛！」他仍是用一副發生了甚麼重要大事的誇張語氣。

90 年代初那幾年，好多香港電影都拍奇案題材，其實大部分都是借單案合理地去拍一齣三級片出來。有些所謂奇案，更加是純創作。健是奇案片的擁躉，最喜愛的一齣是《替天行道之殺兄》——原因當然不是吳岱融或何家駒，而是鍾淑慧。1994 年上映時他有找我去看，我以準備 mock exam 為由，拒絕了他。

到後來有機會欣賞這齣被健形容為「喪盡天良地精彩」的《替天行道之殺兄》，完全是多得他。他很有心，租了 LD，錄好，揀在考 mock exam 最後一天，把錄影帶交給我（錄影帶還好好地放在一個公文袋裡）。

「考完 mock，好好休息一下。」

一年之後，我和健都是大學生。

分別是，健是經常和一大班同學在一起的大學生，而我是個正在習慣沉悶，習慣自己一個人的大學生。

年廿六，天氣有點冷，挨年近晚。搭正 12 點去到 UA6，健已經在戲院外。他說他早了十五分鐘來買飛，怕多人，但根本就沒有人排隊買飛。

霎時間不知說甚麼好。

不知怎樣展開話題。

慶幸健沒有這個問題。

「你早五分鐘來的話，就會見到排我前面的女仔，好正。」踏入新一年，做大學生也有半年了，健對心中美好事物的形容依然沿用「好正」。

我問他為甚麼不約同系同學去看《賊王》，他說同學們都只看西片。港產奇案片？沒一個感興趣。

嚴格來說，《賊王》絕對不是奇案片，而只是找來一些現成案件和犯人形象，湊合成一齣剝削電影——剝削關秀媚的電影。

而且真正剝削關秀媚的不是男人，是女人。

飾演這個專門剝削女人的女人，是關寶慧。

整齣《賊王》沒有露三點（兩點也沒有），沒有過火的暴力，卻比過往（被健叫我）看的奇案片更暴力。所有暴力，都被施加在關秀媚這一個女人身上。

不見血。暴力原來不需要見血。

「關秀媚好正。」散場時，健這樣說。

我留意到他的語氣。他不是說「關秀媚好正！」而是說「關秀媚好正。」——不像過往那樣激動，反而很平靜，離奇地平靜。但愈平靜，愈凸顯他正在用力克制那份亢奮。

健和我都未食晏，自自然然，行了過去瀝源邨。以

前和他經常去蘭香閣，但對上一次，已經是舊年秋天的事。

揀了一個我們坐慣的卡位。突然想起，宣布聯招結果那一天，也是和健約在這裡，坐在這裡，一齊揭報紙看。

互相交代了一些近況。他上了莊，做宣傳。「不做主席？」我問他。他說：「這些拋頭露面角色不要預我。」

認識他七年有多，他肯上莊，有理由相信，原因只有一個——他想追的女同學，是莊員。現在已是他女友。

「她叫 Mabel。」

「個名有點俗。」

「她好正。」

根據健的形容，關秀媚好正，Mabel 也好正，那麼，這兩個同樣被他形容為「好正」的人本質上有甚麼不同？我好想知，但沒有問。

然後說到上學期的 GPA。

「我得 2.71。」

「不過不失啦。」

「但師兄說最好過 3。」

「Year 1 第一個學期而已，還有五個學期慢慢追。」

「你呢？過不過到 3？」

「3.4。」

我又聽到剛才他提到「關秀媚好正」時的平靜語氣，離奇地平靜。

但愈平靜，愈凸顯他正在用力克制那份亢奮。

###

想不到竟然會期待上堂。

期待「哲學概論 II」。自從第一堂，姓陳的老師以那句「人不能踏入同一條河兩次」作為形而上學課的開場白，我才終於明白，我真正想讀的是哲學。

而不是歷史。

至少截至目前為止，仍沒有任何歷史系的課足以令我期待。

例如「秦漢史」，老師沒有任何一句話能為我帶來相等於那句「人不能踏入同一條河兩次」的震撼。他會做的，就是把寫滿了筆記的膠片，放在投影機的玻璃面上投影出來，然後照住讀，沒有感情地照住讀。讀完，拎起膠片，放上另一張，而同學就趕忙把投影出來的筆

記抄下來。

好討厭這種教學方法。

但我是個庸俗的人。庸俗的人其中一種特質就是隨波逐流，所以我同樣有抄那些投影出來的筆記，拼了命去抄。

文卻沒有。

今個學期我和文都選修了「秦漢史」和「西洋經濟史」，其中「秦漢史」的導修課，我更被助教安排和他一起做報告。

「好似當我們中學生。」休息時，文跟我說——又或者他只是在自言自語，只不過剛好我在他身旁。

我們在潤昌堂的汽水機前，他撇了一包檸檬茶，我撇了罐可樂。今天其實有點凍，但好想飲可樂。

「他當我們中學生來教，那麼，他其實也只是把自己當作中學老師。」對於文這句話，我沒意見，嚴格來說，不知應給予甚麼意見。

「好無聊啊。」

「提一提你，還要約其餘兩個同學傾 tutorial，三星期後就輪到我們 present。」

「更無聊啊。」他一口氣將檸檬茶飲完，以射籃方式，將紙盒投進垃圾桶（並成功穿針）。

有樣學樣，我嘗試把可樂罐投進垃圾桶——撞到垃圾桶的邊，可樂罐彈落地。行過去把罐執起時才發現，歷史系其中一個被不少男同學留意的女同學，原來一直在不遠處。她應該目擊我的失敗。

返到課室，老師早已把即將會照住讀的膠片投影出來。有同學已經偷步，開始抄。

「落堂後你會不會落沙田？」回座位後，文問我。

「會，打算去戲院。」

「看哪一齣戲？」

「打算看《流氓醫生》。」

「誰做的？」文經常買外國電影雜誌來看，但對於香港電影，他總是沒太大興趣。

「梁朝偉、劉青雲、許志安——」

「女演員呢？」

「梁詠琪、童愛玲、鍾麗緹——」

文深呼吸口氣，再用力呼出。

「你有興趣？」我問。

「完全沒有。」文刻意停頓了一下，「但反正得閒。」

落堂，我們行出去大埔道等巴士，好快就來了一架72A。今天運氣應該不錯，我試過等四十分鐘才有車。

文在巴士上層揀了一個後排座位，坐低後，拎出一

本書。

是《玩笑》。作者是米蘭·昆德拉。我在旺角的二樓書局見過他的小說，曾經想過買來看，但揭了幾頁，幾深奧，便把書放低。

「你有看過他的小說？」

「之前看過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和《賦別曲》，好鍾意，便找回他第一本小說來看。」

「別人說他寫的都是傷痕文學。」我是從一篇報紙專欄讀到的。

「如果有人用『傷痕文學』來形容昆德拉的作品，足以證明那個人看得不夠深入，甚至根本看不懂——不過算啦，那個人要這樣形容，是他的自由。」

我本來也想從書包拎那本新買的《悲劇哲學家尼采》出來看，但心想好快落車，不看了。

巴士駛到禾輦邨時，文突然說（我不肯定他對我說，抑或自言自語）：「在這個世界裡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，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。」如無意外，應該是《玩笑》的內容。

他提高聲量，以朗讀方式再說一次：「在這個世界裡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，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。」

我從未見過他這樣子。經過了一個學期，我大致

明白文這個人，但這樣在大庭廣眾之下朗讀小說內容，倒是第一次。慶幸巴士上層除了我們以外，就沒有其他人。

「在課室裡，那個 lecturer 的一切教學方式都預先被原諒了，一切教學方式皆可笑地被允許了。」

「我沒有允許他——」

「但我見你有抄筆記。」

或許，在文眼中，我這個抄筆記的舉動，已代表我允許了 lecturer。

###

「剛才你沒提及杜德偉有份做。」

散場，離開戲院時，文這樣問。

我沒有提及杜德偉嗎？忘記了，或許真的沒有吧。自從他去了台灣發展，跟蘇慧倫以情侶形象合唱〈舊情復熾〉後，我就開始討厭他——之前也談不上喜歡，但至少不會討厭，他有份主持的《點解咁好笑》，我初中時集集追。

「有影響嗎？反正他不是主角。」我交出一個連自己也覺得牽強的解釋。

「當然有影響，我從沒想過他識做戲，而且效果竟然那麼好。」

我不能接受文對杜德偉演技的高度評價，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反駁。

文沒有等我反駁，繼續說：「基本上就只有他的角色有真實感。」

我再一次不能接受文對杜德偉飾演的角色左自傑的高度評價，但又再一次的不知應該怎樣反駁。

「連梁朝偉的角色也不真實？」

「最不真實的就是他，他的設定，不就是聖人一個？分別只在於他並沒有被賦予典型聖人的典型言行。」文點了煙，吸一口，一邊把煙呼出來，一邊說：「他一開始就是聖人，他完全沒有改變，沒有成長。沒辦法，聖人不需要改變和成長。」

「但的確好看。」

「但有點作狀。」文又吸了口煙，「不過他的角色再作狀，都及不上那條街作狀。」

無意唱反調，但的而且確好鍾意劉文診所的那一條街。

「我認為它想呈現一個景象——最污濁的人和事物，是可以和最聖潔的自自然然放在一起，而事前沒有